

昌江耐村曾是吸毒重灾区

深受其害的村民自发成立禁毒宣传组织

开展帮教 帮村民脱贫致富

核心提示

古老的昌化江从深山里蜿蜒而下,和沿岸许多村庄一样,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耐村聚居着一群自称“哥隆人”的群体。这里曾是毒品肆虐的地方。上世纪90年代初,几名外出务工的耐村人将毒品带回村子,此后呈现泛滥趋势,严重时,甚至全村平均每8户就有1名村民吸毒,更有11人因为吸毒死亡……“吸毒村”的恶名由此而来。然而,近年来,在昌江县司法局、县禁毒委的长期普法宣传教育下,不愿再背负恶名的耐村人开始了艰难的转变,村民自发成立禁毒宣传组织,积极开展帮教工作,并帮助曾染毒瘾的村民脱贫致富,远离毒品。变化是巨大的:2015年不少吸毒人员开始主动戒毒,没有出现新生吸毒人员,全村转移富余劳动力1240人,人均年收入近2700元,“吸毒村”的阴影,已在逐渐远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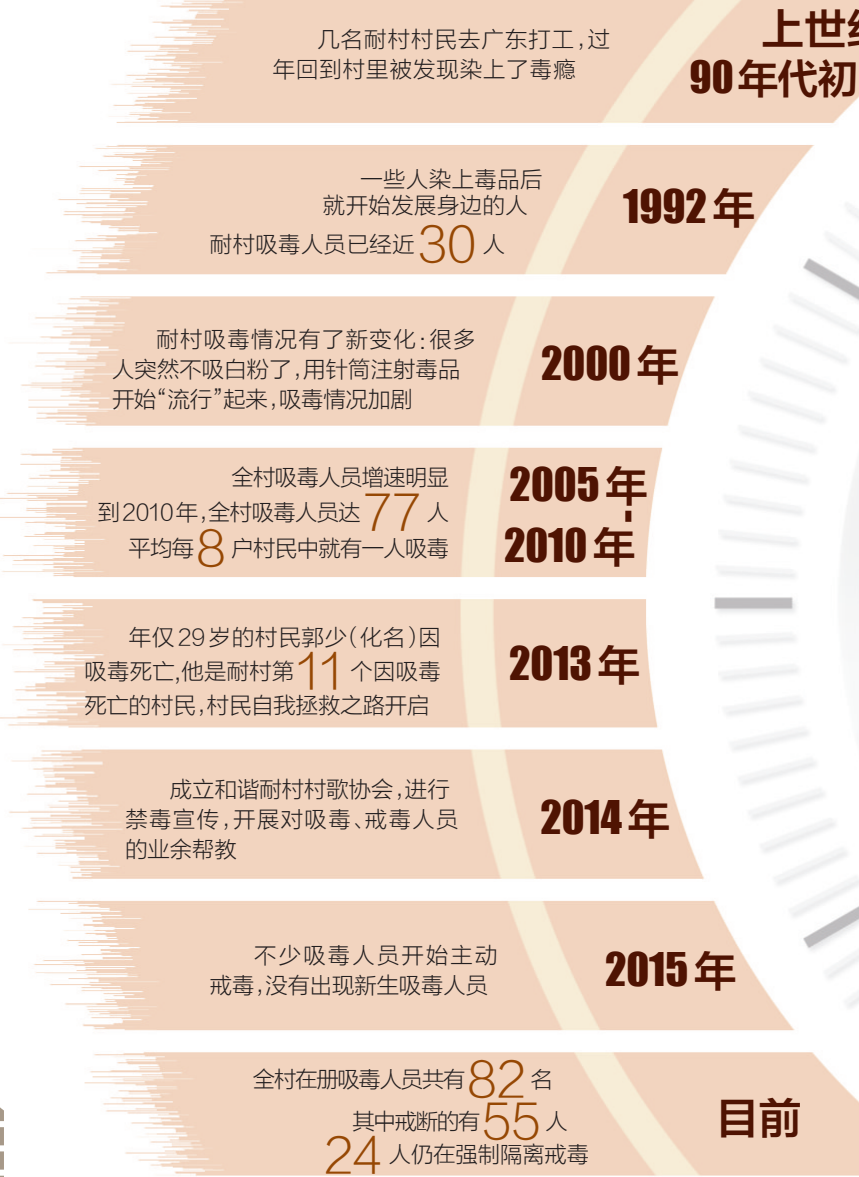
被“拉下水”的村民

村里大量的闲置劳动力为谋生计,外出打工,一些人被毒贩“拉下水”,染上毒品后,就开始发展身边的人

耐村位于昌江县西北部的昌化镇,在昌化江畔。一进入村内,耐村小学围墙上,“吸毒违法,贩毒有罪”、“珍爱生命,远离毒品”等有关禁毒的宣传标语特别醒目。而村“两委”办公楼背面的墙体上,村民的涂鸦虽然若隐若现,但“某某吸毒死了”几个猩红大字依然能看得清,格外刺目。一切,都暗示着这里曾经因“毒品”而深受苦难。谈及“毒品”,耐村村民几乎没有人能说得清,村子具体是啥时候染上这东西的。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,几名耐村村民去广东打工,过年回到村里就被发现染上了毒瘾。在耐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钟有隆的记忆中,这些人耐最早吸毒的人。钟有隆告诉记者:“那时候,村里人大部分在家务农,种水稻的、种甘蔗的都有,但在当时交通条件下,即使农作物有收成,也难以运出来,大家挣不到什么钱。”

因此,村里有大量的闲置劳动力,为了谋生计,部分村民开始远走他乡,到外地打工,一些人很快被毒贩“拉下水”。一些人染上毒品后,就开始发展身边的人。到1992年,耐村吸毒人员已经近30人。大多数吸毒者都有相似的经历,最初接触毒品时,他们并没有意识到,这是一个可怕的开端。32岁的年龄,按理说是心智成熟了的,但村民郭运江(化名)正是在那年染上了毒品。郭运江家境贫困,在他很小的时候,父母就双双去世。靠着一身木工手艺,他一步步打拼,成家立业,彼时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。

“试一试吧。”有一天,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拿出一些东西给郭运江。这是郭运江第一次接触到海洛因。“第一口,很难吃,差点吐了。”令郭运江没有想到的是,不到一个星期,他开始忍不住想念海洛因的味道。持续吸了四五个月后,郭运江感觉自己彻底离不开毒品了。“吸了之后,大脑一片空白,好像可以短暂地忘记一切。”当年9月16日,正和朋友一起吸毒的郭运江被警察抓住,并被送到戒毒所强制戒毒。其实,这么多年过去了,郭运江也没想当初为什么就着了迷。“也许,就只是心里好奇吧。”郭运江说。在那个年代,大家都知道白粉就是毒品,但不知道毒品具体有什么危害,以为跟抽烟一样。”钟有隆说,当时家里有吸毒的孩子,村民向家长提醒,家长大多时候会不高兴,认为毁坏了孩子的名声,所以一致对外称“孩子没有吸毒,就是在吸烟”。



失控的村庄

2000年开始,耐村吸毒情况有了新变化:很多人突然不吸白粉了,用针筒注射毒品开始“流行”起来,吸毒情况加剧

那时,在贫困的耐村,青少年因念不起书,辍学在家的现象比比皆是。在当时的条件下,村子里几乎没有娱乐,连电视机都很少,漫长而无聊的日子里,部分青年很快就跟吸粉的人混到一起去了。钟有隆回忆说,村里很多青年用烟纸将白粉卷起来吸,骗家长是在抽烟。为了弄到毒资,今天说要二三十块钱买烟,明天说要二三十块钱出去玩,其实,这些钱都被他们拿去买毒品了。这对于当时的农村家庭来说,是难以承受的。2000年开始,村民发现,耐村吸毒情况有了新变化:很多人突然不吸白粉了,用针筒注射毒品开始“流行”起来。“这说明耐村吸毒情况加剧了。最开始,他们还会找血管注射,后来演变成了直接注射。”与此同时,钟有隆发现村子开始形成恶性循环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染上毒瘾,村子越来越穷。今年已80岁高龄的村民郭阿公在上世纪80年代是村里的“万元户”,一直在村里从事砖瓦生意,家境殷实。然而,自从1997年,两个儿子郭富彪(化名)、郭富龙(化名)染上毒品开始,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“两个儿子当时也就20岁出头,由于染上毒品,家境迅速败落,郭阿公现在住的是破烂瓦房,大儿子郭富彪因为吸毒离了婚,老婆跑了,小孩没人管,上学也没有钱。”钟有隆说,郭阿公一落千丈的家境,常常成为村民闲时“谈资”。“这就是吸毒导致妻离子散的例子。”

第11个人的死亡

村民发现,无意中耐村已有11人因为吸毒死亡,年龄均没有超过40岁

2013年的一天,一个消息再次“引爆”了这个小山村:耐村村民郭少(化名)因为吸毒死亡,年仅29岁。有着8年吸毒史的郭少,常年在外打工,村里熟悉他的人并不多。从村民口中,记者也只能了解到一些零碎信息,大意是“郭少在海口打工,晚上吸毒后休克就再也沒有醒过来”。“以前也有人因此去世,但郭少是最年轻的一个。如果不是染上毒品,正值壮年的他们都是好劳动力,都会是家里的顶梁柱。”钟有隆惋惜道。记者了解到,海洛因成瘾者的死亡率

村民的救赎

村民成立“村歌协会”进行禁毒宣传,进村入户,开展对吸毒、戒毒人员的帮教

趁着这个势头,村民自发在耐村成立了“村歌协会”,进行禁毒宣传。今年55岁的郭洪德会长,也是村里的老村干。耐村是革命老区,眼看着沦为昌江全县毒品形势最严峻的村庄,村民为筹集毒资,我骗你、你骗他,这样的村子是没有未来的。为挽回名誉,必须做点什么。”郭洪德说。2014年6月,郭洪德联合钟玉辉、符明豪、符锡连、符福志等4名村民正式向有关部门申请成立和谐耐村村歌协会。“它既是一个协会,也是一个禁毒宣传帮教组织。”据郭洪德介绍,村歌协会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创新禁毒宣传教育模式,自编自演禁毒“村歌”和小品,进行禁毒宣传。“在协会成立之前,我们也进行过帮教,每次通知开禁毒大会,村民积极性并不高,现在一说办晚会看演出,村民都来了。”“吸毒的原来开小车,现在连辆都没有”“吸毒的原来住高楼,现在住破瓦房”“一人吸毒,全家遭殃”……村歌协会在创作时,往往以村里吸毒家庭的前后遭遇为

题材,用村民身边的真实案例,告诫村民毒品带来的危害。村里语言以“哥隆话”为主,许多村民只懂本民族语言。为了解决这一困扰,协会尝试用“哥隆话”,将禁毒宣传知识编成脍炙人口的村歌,禁毒宣传效果明显,“我们的行为得到村民大力支持,许多村民还捐钱为协会购买音响设备。”郭洪德说。此外,村歌协会的另一项职责是进村入户,开展对吸毒、戒毒人员的帮教。郭洪德说,很多戒毒人员从戒毒所一出来,经不住诱惑,就又吸上了。“必须让‘瘾君子’们走出‘吸了戒,戒了吸’的怪圈。”“千万不能复吸,一定要戒断,靠自己勤劳致富,这样别人才看得起你。”在戒毒所完成强制戒毒的郭晓(化名)回到村里,每次见到他,郭洪德都会苦口婆心地劝说。郭晓已经是“二进宫”,为了管住自己的嘴,他决定听从郭洪德的劝说,出所后,就与原来的朋友断了联系,并独自前往外地打工。“要是再跟原先朋友在一起,说不

比普通人群高,其中,因吸毒过量致死的尤其突出。此外,海洛因过量或中毒时,还可以发生海洛因性肺水肿,起病较急,如抢救不及时往往引起死亡。同时,吸毒者还可能死于吸毒引致的各种感染,特别是注射吸毒者,化脓性感染的发生率较高,而严重的感染可引起呼吸衰竭而发生猝死。村民们发现,随着郭少的死亡,不经意中耐村已有11人因为吸毒死亡,年龄均没有超过40岁。死亡往往能带给人们最深刻的警醒,村民的担忧越来越明显:如果再不向毒品“宣战”,耐村的未来怎么办?

耐村的重生

摆脱“吸毒村”恶名的同时,耐村大力发展经济,引进龙头企业2家,建立标准化示范基地320亩,让村民摆脱贫困,走上致富之路

非常严重的一段时期。据统计,在此期间,全村吸毒人员增速明显,到2010年,全村达到77人,平均每8户村民中就有一人吸毒。在钟有隆印象中,在那个疯狂的年代,因为缺钱买毒品,吸毒的人偷家里东西卖钱,没有东西可卖了,就出去偷、去抢,村里的偷盗情况越来越多。那时候,每到过年,是村里最乱的时候。钟有隆不得不联络村里所有的村民小组组长,安排专人值夜班,围着村子巡逻,专门抓小偷。“有时候,半夜村里会打开广播,把村民喊起来查看耕牛被偷了没有。很多村民被毒品害得惨不忍睹,整个村子像失控了一样。”回想起那段岁月,钟有隆感慨不已。

今年已是39岁的郭运江戒断毒瘾的第6个年头,见到他时,他正在猪圈里喂猪,其实他更擅长做木工。2011年强制戒毒后回到村里的郭运江,面对自己的人生茫然不知所措,想重新做木工,但村里人一听说他吸过毒,都不再请他。在此情况下,为了帮助郭运江重新回归社会,村干部为了他一家一户地去解释“说好话”,告知村民郭运江的良好戒毒表现,没有出现复吸。在村干部的帮助下,村民开始慢慢接纳他。郭运江也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,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次的工作,除此之外,还和妻子养起了猪,一家人生活虽然算不上宽裕,却安宁而恬静。不久前,他家还新建了一栋两层小洋楼。郭运江感慨地说,他又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尊严。李海栋(化名)是在27岁那年染上毒瘾的,在那期间,家里值钱的东西,隔三差五就不见了,父亲的存款也很快就被挥霍一空。为了帮助李海栋戒毒,郭洪德多次上门前去进行劝说,最终帮助家人将他送到戒毒所强制戒毒。回到村里后,李海栋三年来没有复吸,甚至连烟都戒了。在村干部的帮助下,安心在家里干起了农业生产,在村里承包地种起了辣椒,平时在村里做零工,一年收入有三四万元。“摆脱毒瘾,成为正常人,赚钱养家,绝不再碰毒品了。”李海栋说。

“摆脱‘吸毒村’恶名的同时,我们还要让村民摆脱贫困,走上致富之路,才是耐村真正的重生。”钟有隆告诉记者,近年来,耐村大力发展经济,引进龙头企业2家,建立标准化示范基地320亩,培养种

定义吸上了,所以,我打工的地址没有跟他们讲。这两年来,我远离毒品。”2015年7月,昌江县禁毒委、县公安局决定对耐村毒品问题进行综合整治行动,在耐村创建社区戒毒(康复)中心。昌化镇派出所所长陆才博告诉记者,社区戒毒(康复)中心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全村吸毒人员进行摸底,并逐一登记造册,督促吸毒人员积极参与社区戒毒(康复)工作。同时,对每个未被关押的吸毒人员采取帮教措施,努力杜绝新生吸毒人员和减少复吸现象发生。

记者了解到,耐村社区戒毒(康复)中心了解到,不包括已经死亡的11人,目前全村在册吸毒人员共有82名,其中戒断的有55人,24人仍在强制隔离戒毒,新增吸毒人员2人,被羁押1人。“其中的2名新增吸毒人员为外出务工人员,以前就有吸毒,最近返村才被发现,所以并没有新生吸毒人员,贩毒现象也几乎绝迹,目前来看,耐村毒品形势已经得到稳定控制。”

耐村的重生

摆脱“吸毒村”恶名的同时,耐村大力发展经济,引进龙头企业2家,建立标准化示范基地320亩,让村民摆脱贫困,走上致富之路

今年已是39岁的郭运江戒断毒瘾的第6个年头,见到他时,他正在猪圈里喂猪,其实他更擅长做木工。2011年强制戒毒后回到村里的郭运江,面对自己的人生茫然不知所措,想重新做木工,但村里人一听说他吸过毒,都不再请他。在此情况下,为了帮助郭运江重新回归社会,村干部为了他一家一户地去解释“说好话”,告知村民郭运江的良好戒毒表现,没有出现复吸。在村干部的帮助下,村民开始慢慢接纳他。郭运江也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,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次的工作,除此之外,还和妻子养起了猪,一家人生活虽然算不上宽裕,却安宁而恬静。不久前,他家还新建了一栋两层小洋楼。郭运江感慨地说,他又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尊严。李海栋(化名)是在27岁那年染上毒瘾的,在那期间,家里值钱的东西,隔三差五就不见了,父亲的存款也很快就被挥霍一空。为了帮助李海栋戒毒,郭洪德多次上门前去进行劝说,最终帮助家人将他送到戒毒所强制戒毒。回到村里后,李海栋三年来没有复吸,甚至连烟都戒了。在村干部的帮助下,安心在家里干起了农业生产,在村里承包地种起了辣椒,平时在村里做零工,一年收入有三四万元。“摆脱毒瘾,成为正常人,赚钱养家,绝不再碰毒品了。”李海栋说。

“摆脱‘吸毒村’恶名的同时,我们还要让村民摆脱贫困,走上致富之路,才是耐村真正的重生。”钟有隆告诉记者,近年来,耐村大力发展经济,引进龙头企业2家,建立标准化示范基地320亩,培养种

养殖户3个,带动农民发展热带高效农业800亩,转移富余劳动力1240人,目前,全村人均年收入已近2700元。

“更让人高兴的是,随着禁毒观念深入人心,现在耐村形成了‘村民一村委会一派派出所’的良好沟通机制,村民一旦发现吸毒迹象,立马报告村委会,村委会再打电话到派出所里。”陆才博表示。“全民达成共识,共同努力,将会对吸毒人员起到持久的帮助和监督作用。”

记者从2016年全省公安机关打击毒品犯罪推进会上了解到,2015年,海南各级、各部门深入扎实开展禁毒人民战争,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2949起,抓获犯罪嫌疑人3168名,缴获各类毒品1530千克;查获毒品治安案件1.6万余起,查获吸毒人员1.7万余人次;强制隔离戒毒吸毒人员8344名,行政拘留吸毒人员8731名。

“必须清醒地认识到,毒品形势仍然不容乐观,禁毒工作依然任重道远。”省司法厅法制宣传处处长刘京表示,昌江耐村曾经是吸毒重灾区,经过县司法局、县禁毒委的长期深入细致的普法宣传教育,实现了村民由被动接受教育到主动进行自我救赎的根本性转变。村民自编自导的文艺节目融法于戏,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
“耐村的经验为海南普法提供了启示。‘七五’普法期间,在积极推动落实‘谁执法谁普法’责任制的同时,我们计划将指导农村农民进行自发普法、互动教学、自我净化,作为今后普法教育的一个方向去尝试。”刘京表示。

(本报海口2月29日讯)



村民在参观禁毒宣传长廊。 通讯员 高凌 摄